

《曼陀罗译丛》总序

林贤治

说到翻译，自然会想起鲁迅。

作为现代翻译的前驱者，鲁迅最注重的无疑是精神，是思想的破坏和建设。他翻译社会科学书籍，犹如“盗天火”虽然本意在“煮自己的肉”可是黑暗中毕竟留下了令人瞩目的火光；用他的另一个比喻来说，亦即所谓“偷运军火”罢。至于文学作品，所译除了俄国几乎全属被压迫的弱小的民族；选择的作家，也都偏重不大著名或竟是无名的，甚至有意避开“大师”——事实上“贩卖”大师者大有人在。他走着自以为“最平正的道路”，用文艺来沟通人类，使彼此不隔膜，相关心。他提倡“硬译”，简直唱独角戏，恐怕至今仍然逃不掉博雅之士的讥诮，而以为愚拙。然而，他的目的，正在于拿来救治中国人的思维和文法的贫乏。思虑是更广泛

的。

战争，运动，大半个世纪已然过去，可谓世易时移了。今天，除了一些必须的禁忌以外，好像一切都变得“商品化”起来。其中包括文学翻译。一部古典名著，同时衍生出十几个译本；重译未尝不好，无奈粗劣得可以。严肃一点的著作无人问津，而色情、暴力、迷信，却蒙了众多洋人的脸谱，日见挤轧于书肆。细究起来，这也原不足怪的。正如火药，有用以开路者，有用以搏击者，但也有用做爆竹，放焰火者。同为翻译，相去又何止十万八千里！

有时候便想：鲁迅当年开的路，究是个人走的呢，抑且给后人走的呢？他如此说过：“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在先生的足迹之后，至今到底有多少人在走？这就不免教人生疑了。

在有限的接触中，知道了居然还有那么几个人，在各自做着寂寞的译事，心里的感动是难以言说的。中国当代散文的路子本来不宽，这几年更见其窄，原因盖在于众多的目光都盯在“纯文学”上面。80年代中期，汹涌一时的社会思想开始退潮，相当大批的作家和批评家陆续宣告回到“专业”里去，唯恐“思想”这东西，最终危及“文体”的正宗地位。于是，美学标准变得至高无上。其实，对于知识分子作家来说，只有当他因广泛的社会关怀而获致多方面的刺激，其自主的开放的思想意识，才需要有相应的多样体裁、技法和风格。任何创造都是一种抗争。在这里，与激情相伴随的不驯的思想永远居于首位，因为只有它，才可以使作家的知识

分子角色得以保持而不致丧失。在此之前，我们简直没有权利奢言艺术的纯洁性。至于思想，本身即具有强大的审美冲击力。真正的美学，是思想的对象化；由于思想对艺术的渗入，从而激发内在生命从脑到心的无比丰沛的交流。我不懂弄翻译，不能作章句的推敲；但是，凭着普通中国人的良知，我能确切地感知这些零散的译稿的价值所在，它们不是一般的文学定义所能范围的。这样也就不惮谫陋，自动承担起邀约，催促，收集，以及联系出版之类的事情来。就算是我同另一位朋友一起做《散文与人》时许下的初衷未改：做一个“拾柴人”。只要有火燃着，——这就是私下所愿望的。

作为一套译丛，而终未以火命名者，盖因另外的一套文丛经由我手已先有了一个我喜欢的名字：“曼陀罗”。心想：就让它们作为姊妹书一样出来吧。

1997年 1月

《曼陀罗译丛》总序	1
《哲学书简》：俄国思想分野的开端（译序）	7

I . 《哲学书简》

目 录

第一封信	29
第二封信	55
第三封信	74
第四封信	89
第五封信	104
第六封信	122
第七封信	156
第八封信	183

II . 疯人的辩护

疯人的辩护	193
附 1：恰达耶夫与普希金的通信	215
恰达耶夫致普希金 1829 年 3—4 月）	215
普希金致恰达耶夫（1831 年 1 月 2 日）... ..	217
恰达耶夫致普希金 1831 年 6 月 17 日）	217
普希金致恰达耶夫（1831 年 7 月 6 日）... ..	219

恰达耶夫致普希金 1831 年 7 月 7 日)	
.....	221
恰达耶夫致普希金 (1831 年 9 月 18 日)	
.....	222
恰达耶夫致普希金 1836 年 5 月上半月)	
.....	228
普希金致恰达耶夫 (1836 年 10 月 19 日)	
.....	229
附 2 : 普希金致恰达耶夫的诗	233
致恰达耶夫(1818)	233
题恰达耶夫肖像 1818—1820)	234
致恰达耶夫(1821)	235
致恰达耶夫(1824)	239

《哲学书简》：俄国思想分野的开端(译序)

刘文飞

流动讲坛上的教师

熟悉俄国文学的人，也许对恰达耶夫这个名字并不十分地陌生。因为普希金的诗作《致恰达耶夫》曾为人们所广为传诵。彼得·雅科夫列维奇·恰达耶夫(1794—1856)生于一个俄国贵族家庭，父母早亡，他由姨妈和舅舅抚养成人，曾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数年，后进入俄国近卫军，参加了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表现英勇，战后，却令人意外地离开了军队。他曾与十二月党人接近，但觉得与他们的思想和理想也有一定的距离。1823—1826年，恰达耶夫去西欧各国游历，西欧和俄国的对比，使恰达耶夫的思想受到震荡，归国后他幽居数年，一直处在沉思之中。此后，他开始频繁地出现在

莫斯科的各种沙龙中，慷慨激昂地陈述自己的哲学、宗教观点，对俄国的历史和现实作出评判，向人们描绘着理想的未来社会，引起了知识界和上层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他的书信、手稿等等也为人们所争相传阅。在当时，恰达耶夫的一言一行，都会成为社会的话题，他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俄国诗人维亚泽姆斯基曾称恰达耶夫为“流动讲坛上的教师”（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 с подвижной кафедры）。

每一民族都需要自己的思想家，无论它处在其发展的何一阶段，无论这一民族的精神天性是怎样的。恰达耶夫曾在《哲学书简》的第一封信中写道：“人民群众服从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定的力量。他们自己并不思考；他们中间有一定数量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替他们思考，给民族的集体理智以冲击，并推着民族前行。在少数人进行思考的时候，其它的人在感受，其结果，便实现了共同的运动。”在第二封信中，他又写道：“问题在于，各民族在人类之中的意义，是由其精神上的强大所决定的，各民族引起的关注，取决于其在世界上的精神影响，而不取决于其发出的喧嚣。”可见，深刻的思想和深刻的思想家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何等地重要！在俄国思想史上，恰达耶夫恰是最早一批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家之一，在恰达耶夫之前，专门对俄国的历史、使命和民族性等进行思考的人并不多，而在他之后，这样的思想家及其成果却不断涌现。当然，这与恰达耶夫所处的时代有关，从 19 世纪 20 年代开始，许多欧洲思想家、哲学家都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对文明的历史、人

类的使命等等的思考；而在俄国，在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取得胜利之后，俄罗斯人的民族意识空前觉醒，随之而来的，便是对民族的特性及其地位和使命的认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是俄国民族意识觉醒过程中的产物，但反过来，这一著作又进一步促进了这一觉醒过程的深化。恰达耶夫及其《哲学书简》对于俄国文化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他 / 它的观点、他 / 它的结论 而在于他 / 它较早地向人们展示出了思想的力量和意义，使俄国初步具有了自省意识、批判精神和思辨传统。而这，正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家之于其民族和国家的意义。

恰达耶夫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力量，还体现在他对同时代人巨大的影响上。有人说，他甚至“赢得了敌人的尊敬”。比如，作为其论敌之一的斯拉夫派代表人物霍米亚科夫曾言：恰达耶夫的敌人似乎更看重他，他不是文学家，不是哲学家，也不是政治家，而是这一切的统一，因为他在思想沉睡的时候出面唤醒了众人。俄国诗人丘特切夫也曾说：“恰达耶夫是他最少赞同的人，同时却是他最多热爱的人。”普列汉诺夫在谈到恰达耶夫的时候说：“恰达耶夫以一封《哲学书简》为我们思想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远远地超出了一位勤勉的俄国研究家依据‘地方统计数据’完成的数立方俄丈的著作，远远地超出了杂文‘流派’一位敏捷的社会学家所做的一切。”（《普列汉诺夫二十四卷集》第 10 卷第 135—136 页）

哲学和宗教的结合

《哲学书简》由八封信组成 这些书信写于 1828—1830 年间，是写给一位名叫叶卡捷琳娜·德米特利耶夫娜·潘诺娃的夫人的，她是莫斯科一个沙龙中的女主人。在恰达耶夫写作后几封信时，他与那位夫人的书信往来已经中止了，所以，恰达耶夫心目中的收信人，自然不止潘诺娃夫人一人，而甚至是所有的俄罗斯人，所有的后来人。在这些书信中，只有第一封在恰达耶夫生前发表过。

普希金在致恰达耶夫的一封信（1831 年 7 月 6 日）中，曾提及恰达耶夫的“整个作品没有谋篇和布局”当然 普希金也意识到 这是书信“这种形式更有权利走笔随意和从容”。恰达耶夫自己也曾曾在多处谈到其作品的“不足”如在第七封信中 他写道：“将这些书信付印，我们也许应该请求读者迁就其文体上的弱点乃至错误。”我毫不怀疑 如果这些书信偶然地面世了 人们一定会指责它们的悖论。”然而 通读完这些书信，不难看出，它们已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中间贯穿有严密的逻辑线索。

在第一封信中 作者要“谈谈我们的国家”弄清它的历史及其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同时，也追溯了宗教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第二至第五封信所探讨的都是宗教的意义和力量。第二封信论证，人需要过精神的

生活。第三封信论证，人的理性应当服从于最高的理性。第四封信论证，精神世界是不可度量的，无限构成了造物主的神性。第五封信论证，万物之中存在着绝对的统一，这便是上帝与其选中的人的第一次交谈，人类理性的真正来源，就是代代相传的关于这次交谈的记忆。将这一切结合起来，恰达耶夫旨在证明，宗教尤其是天主教，包含着哲学、历史和科学，历史和科学不过是宗教哲学的组成部分，宗教具有巨大的认知能力和改造能力，人类的进步只可能存在于这样一种宗教前提下的统一之中，俄国的进步自然也不例外。在第六、第七封信中，作者对欧洲的历史进行了考察，站在宗教的立场上，对摩西、大卫、穆罕默德、苏格拉底、马可·奥勒留、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荷马等历史人物作了评说，对古希腊罗马时代、文艺复兴时代、宗教改革运动，他持强烈的批评态度，而对宗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却评价甚高，认为它保持了精神的生活，维护了欧洲的统一。第八封信具有总结意味，认为基督教的生活是人类真正的生活，至高理性光照下的精神统一是整个人类未来的方向。

作为一位唯心主义的宗教哲学家，恰达耶夫深受德国哲学家谢林的影响。1825年，恰达耶夫曾与谢林在卡尔斯巴德（今捷克城市卡罗维发利）相见，作过长谈，恰达耶夫很敬佩谢林，谢林也很欣赏恰达耶夫，后来曾称后者为“他所认识的人当中最聪明的人”。后来，他们还有过许多通信。无论是谢林早期那种主张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融合为一的“同一哲学”还是

他后期那种主张世界源于上帝、又归于上帝的“天启哲学”，对恰达耶夫都深有影响。1832年，恰达耶夫在致谢林的一封信中写道，“哲学与宗教结合的伟大思想”，是他“精神活动的灯塔和目的”：“我存在的全部兴趣、我理性的全部求知欲，都为这唯一的思想所包容了；随着思考的深入，我愈发坚信，人类的主要兴趣就包含在这一思想之中。”这段话对于理解《哲学书简》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恰达耶夫从对俄国现实的观察入手，追溯至俄国的历史，认为俄国落后的现实，是由其历史所造成的；对俄国历史的反思，使他步入了宗教范畴，认为欲解决俄国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只有借助宗教的影响和力量；对宗教及其作用的意识，则使他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他在宗教之中看到了“最初的推力”和“普遍的规律”，而追求与“绝对理性”和“至高思想”的接近，就是个人和整个人类的使命。在“宗教与哲学的结合”中，恰达耶夫看出了、同时也向当时的人们指出了俄国和世界的未来。

爱祖国与爱真理

《哲学书简》中的第一封信于1836年9月底在《望远镜》杂志上刊出后，引起轩然大波。恰达耶夫的外甥日哈列夫（М. Жихарев）后来曾在关于恰达耶夫的传记中不无夸张地写道：“自俄国有人开始了写作和阅读以来，自俄国有了书籍业和识字活动以来，无论此前还

是此后，还没有过任何一件文学的或学术的事件（甚至包括普希金的去世在内）曾产生过如此巨大的影响和如此广泛的作用，曾传播得如此之迅速，如此之热闹。将近一个月，在整个莫斯科，几乎每一个家庭都在谈论‘恰达耶夫的书’和‘恰达耶夫事件’。然而这些‘反响’却主要是反面的。许多读者被激怒了，作者被斥为俄罗斯的“敌人”和“叛徒”。莫斯科大学的学生致信书刊检查委员会，宣称准备拿起武器来捍卫俄国的荣誉。10月19日，俄国书刊检查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这篇文章及其产生的影响；三天之后，甚至连沙皇本人也出面干预了，他颁布了一道谕旨，称其已读该文，认为它“是一个疯子大胆的胡言乱语”，并下令关闭《望远镜》杂志追究有关人士的责任。《哲学书简》的作者被官方宣布为疯子，官方派出的医生每天去给恰达耶夫“治病”。当时的一位作家亚力山大·屠格涅夫曾在致诗人维亚泽姆斯基的一封信中忧心忡忡地写道：“医生每天去看恰达耶夫，恰达耶夫每天都足不出户。我真担心，他的神经真的会错乱的。”恰达耶夫被宣布为“疯人”，就是因为，他对俄国的一切进行了空前严厉的批评。请读一读恰达耶夫在那封信中关于俄国所说的话：

首先是野蛮的不开化，然后是愚蠢的蒙昧，接下来是残暴的、凌辱的异族统治，这一统治方式后来又为我们本民族的当权者所继承了，——这便是我们的青春可悲的历史。……它除了残暴以外

没有兴起过任何东西，除了奴役以外没有温暖过任何东西。在它的传说中，既没有迷人的回忆，也没有为人民所怀念的优美形象，更没有强大的教益。请看一看我们所经历过的所有年代，看一看我们所占据的所有空间吧，——您找不到一段美好的回忆，找不到一座可敬的纪念碑，它可以庄严地向您叙述往事，它可以在您的面前生动地、如画地重现往昔。我们仅仅生活在界限非常狭隘的现在，没有过去和未来，置身于僵死的停滞。

我们没有历史的经验；一代代人、一个个世纪逝去了，却对我们毫无裨益。看一眼我们，便可以说，人类的普遍规律并不适用于我们。我们是世界上孤独的人们，我们没有给世界以任何东西，没有教给它任何东西；我们没有给人类思想的整体带去任何一个思想，对人类理性的进步没有起过任何作用，而我们由于这种进步所获得的所有东西，都被我们所歪曲了。自我们社会生活最初的时刻起，我们就没有为人们的普遍利益做过任何事情；在我们祖国不会结果的土壤上，没有诞生过一个有益的思想；我们的环境中，没有出现过一个伟大的真理；我们不愿花费力气去亲自想出什么东西，而在别人想出的东西中，我们又只接受那欺骗的外表和无益的奢华。

我们在成长，可我们却不能成熟：我们在向前运动，可我们却沿着一条曲线，也就是说，在走着一一条到不了终点的路线。我们就像那些没有学会

独立思考的孩子；在成年的时候，他们体现不出任何自我的东西；他们所有的知识，均局限于他们外在的生活，他们整个的心灵，都存在于他们身外。我们正是这样。

在恰达耶夫看来，俄国构成了人类“精神世界中的一个空白”，俄国人“徒有基督徒的虚名”，甚至连俄国人勇敢的天性，也被恰达耶夫视为一种“恶习”。俄国和俄国人，在恰达耶夫的眼中真可以说是一无是处了。很难想象，这样的话出自一位立过赫赫战功的俄国近卫军官之口；很难想象，这样的话是在俄国因战胜了拿破仑而沉浸于无比的欢乐和自豪的时刻道出的。

然而，恰达耶夫却自认为是爱国的，只不过，他是“以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其爱国之心的，即他所言的“否定的爱国主义”（Негативный патриотизм）。在《第一封信》的结尾处，恰达耶夫就对收信人写道：“我关于我们的国家所说的话，您当会感到是充满苦涩的；然而，我所说的只不过是一个真理，甚至还不是全部。”在《疯人的辩护》中，他更为直接地说道：“对祖国的爱，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是，还有一种比这更美好的感情，这就是对真理的爱。”恰达耶夫在这里所说的“真理”，大约有两重含义：一是指要对俄国人道出关于俄国的“真话”，使他们能对祖国的历史和现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二是指俄国所面对的“绝对真理”，即天启赋予俄国的使命。恰达耶夫的话，使人想起了一位古希腊哲人那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名言。恰达耶夫接着

写道：“请你们相信，我比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更爱自己的国家，我希望它获得光荣，我也能够对我的民族的高尚品质作出评价；但是，我的爱国情感与有些人的有所不同，……我没有学会蒙着眼、低着头、闭着嘴地爱自己的祖国。我发现，一个人只有清晰地认识了自己的祖国，才能成为一个对祖国有益的人；我认为，盲目钟情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首先要献身于真理的祖国。”毫无疑问在这篇文章的表达上有匆忙之处，在其思想中有尖锐之处，但是，贯穿其中的感情，却丝毫不是反对祖国的：这是一种怀着心痛、怀着苦楚表达出来的对我们之软弱的深刻感受，仅此而已。”通过这些话语，不难看出一个爱国者的拳拳之心。

如恰达耶夫所言“爱国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忧国忧民的、痛心疾首的爱国主义，无疑要比随波逐流的、歌功颂德的爱国主义更为有益。然而，古今中外“良药苦口”这一朴素的道理却总是难以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

西欧派与斯拉夫派之争的起源

在俄国思想史和社会发展史中，一直存在着东方化还是西方化的激烈争论。作为一个地处东西方之间的大国，俄国却始终为自己的文化和地域归属而苦恼不堪。

本世纪初的一位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曾说，地

理上的东西方矛盾和社会构成上的上下层矛盾一样，也是俄罗斯最根本的矛盾之一，这一横一纵的两大矛盾，交叉成了俄罗斯民族永远背负的沉重十字架。纵观俄国历史，从斯拉夫部族的东迁到蒙古鞑靼人的统治，从来自拜占庭的东正教的“罗斯受洗”到彼得大帝的全盘西化，从列宁领导的东方社会主义革命到苏联解体后的“回归欧洲”，俄国一直像是一个巨大的文化钟摆，摆在东西两个文化板块之间。俄国究竟该何去何从，这便是赫尔岑所称的“俄国生活的斯芬克斯之谜”（сфинкс русской жизни）。在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取得胜利之后，俄国的民族意识空前觉醒，民族的历史和未来的命运，国家和民族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类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思考和认识。在这一背景下，俄国思想界出现了很大的分歧，迅速分野为所谓的“西欧派”和“斯拉夫派”两大阵营。西欧派主张俄国走西欧列强的发展道路，废除农奴制，发展资本主义，要求言论自由，认为西欧的文明就是俄国和整个人类的未来，该派的代表人物有安年科夫、卡维林、别林斯基、赫尔岑等；斯拉夫派则认为俄罗斯有着独特的历史道路和使命，它具有丝毫不亚于西欧诸国的文明，俄国不需要任何改革，贵族与农民、君主政体和东正教会等等之间的和谐将使俄国在欧洲和世界保持自己的优势，此派的代表人物有霍米亚科夫、阿克萨科夫兄弟、基列耶夫斯基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等。

毫无疑问，恰达耶夫是典型的西欧派。整个《哲学书简》的立论基础就是：俄国应当走西欧的路。恰达耶